

論叢

·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论丛 ·

当代中国学术：

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 ·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論叢

·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论丛 ·

当代中国学术： 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学术: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589-9

I. 当... II. 上...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909 号

当代中国学术: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编者: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常工

封面设计:闵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本:640×935毫米 1/16开

印张:17.5

插页:2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1-589-9/D·055 定价:33.00元

目 录

全球化研究: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曾易水(1)

- 一、全球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
- 二、全球化研究方法/(8)
- 三、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11)
- 四、什么是全球化/(17)
- 五、全球化的分类/(24)
- 六、如何对待全球化/(39)
- 七、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44)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话语权及其思考/权 衡(49)

-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发展的强势崛起和经济学研究的弱势之音/(49)
- 二、经济学在中国的论争及其反思/(50)
- 三、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学及其思考/(58)
- 四、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良知和信念/(62)
- 五、结论与思考:范式革命与国际接轨/(66)

产业经济学的新发展/冯 梅(68)

- 一、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和现状/(68)
- 二、产业发展内外条件的变化及对产业经济学的挑战/(75)
- 三、产业经济学新发展的特点和趋势/(85)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海外社会学界的中国

社会转型大论战及本土学者的回应/李 煜(99)

- 一、市场转型理论的背景和主要观点/(102)
- 二、市场转型论战的分歧/(104)
- 三、理论综合的尝试/(107)
- 四、第三种观点:Walder的产权改革论和精英机会论/(110)
- 五、超越市场转型争论/(114)
- 六、本土学者的回应/(119)
- 七、结论/(122)

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之争/杨晓萍(124)

- 一、引言/(124)
- 二、西方人口转变论评述/(125)
- 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之争/(131)
- 四、对中国人口转变理论之争的评述/(147)
- 五、结语/(153)

“问题政治学”思想在中国的兴起/胡 键(158)

- 一、“问题政治学”的兴起/(159)
- 二、“问题政治学”的历史渊源/(165)
- 三、“问题政治学”的性质、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171)
- 四、“问题政治学”的意义及发展趋势/(176)

法律经济学与中国法学/刘迎霜(185)

- 一、法律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形成和发展/(185)
- 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局限性/(195)
- 三、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6)

对话主义与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建设/曾 军(216)

- 一、对话的先声:“复调”争论中的接受自觉/(216)
- 二、走向交往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231)
- 三、如何对话:巴赫金接受史之于西学新潮下的接受史

研究的启示/(245)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 考察/王 健(254)	
一、导言:解放前后关于民间信仰研究的 成绩、不足与停滞/(254)	
二、近年来民间信仰研究兴起的背景/(257)	
三、多学科影响下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259)	
四、研究的反思与前瞻/(269)	
五、余论:关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一点思考/(272)	
后记/(274)	

全球化研究： 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

曾易水

进入 1990 年代，全球化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全球化的口号作为一种超然意识形态而风靡全球。专业学术刊物和大众传媒充斥着关于“全球化时代”的言论，不少国家政府以及企业界努力寻求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策略。这一切，反映了当前学术界、政界、企业界及公众对全球化浪潮的特殊关注。中国也不例外，1990 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到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一事实表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必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是中国各界面对的共同课题。

一、全球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全球化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而逐渐形成的主流观点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是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并日趋发展的客观现象，对它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 150 年前的

当代中国学术：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产阶级必然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由于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这样,人类社会便逐渐冲破了各民族、各国家原有经济体系的孤立和封闭状态,使世界各部分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整体,从而开始了“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

但真正在现代意义上提出并全面论述全球化理论,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最早提出该理论的是“依附理论”学派,其代表人物埃及人萨米尔·阿明首先建构了世界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他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全球分工发生的;在分工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阶层的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不等价交换和剥削;但边缘国家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并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早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阿明就提出了这一思想的框架,其后发展了它。到1960年代,这一理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从1963年开始,安德烈·冈德·弗兰克逐渐成为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丰富了阿明和保罗·巴兰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论,尤其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的概念,指出不发达的现象是以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兴起和扩张为开端的,也是这一进程的结果。巴西学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左进一步用辩证法研究了世界的结构和历史,提出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思想,认为处在边缘区的不发达国家在两个层次上依附于处在中心区的发达国家,即受外部力量(包括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国技术和外国金融体系)的支配和内部力量(即与外国势力相联系的当地阶级和集团)的支配。此外,当时许多思想家都讨论了这些问题。1961年,“global”(全球)一词被收入韦氏辞典,次年

收入牛津英语辞典。之所以如此,是有社会背景的,正像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所说的,“当时已经出现了跨国公司在财源、功能、责任方面替代国家,国家囿于疆土之内而对此无能为力的现象”^①。可以说,这一时期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是全球化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

到了1970年代,随着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人员自由流动现象也出现了。于是,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出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判了以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模式的“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世界结构是一种“生产模式”;其中,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是重要关系,是一种空间共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社会的发展不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分,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的;差别只在于有的在中心、有的在边缘;而在边缘的社会必然是不发达社会。他在方法论上的特别贡献是,主张把全球“关系”、“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要采取传统的以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为“分析单位”的方法。沃氏的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是他的三大卷的《现代世界体系》,分别发表于1974、1980和1989年。近年来,他又与T. K. Hopkins合作出版了《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1945~2025》、《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等。

1980年代初,米歇尔·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里根、撒切尔夫人采用,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开始。债券市场阻隔的消除和非规章化逐渐完成,随后又引起了股票市场阻隔的消除和非规章化,金融全球化全面展开。199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入了这一进程,金融全球化便呈飙升趋势,直到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政治、文化、全球化也发展起来。

^① 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当代中国学术：
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于是,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从1970年代末兴起的罗马俱乐部在对全球问题作了多方面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少研究报告之后,又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例如拉兹洛推出《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等,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85年R. Roberson和Frank Lechner发表《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文化问题》,明确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并提出了与全球化有关的许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①。

1980年代中后期,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提倡解中心、消结构、消边界和多元化,反对中心论、大叙事、一元化和绝对真理,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哲学表现。在这里,被人们所描述的那种还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后”状态,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状态的深层的但却是初期的表现。这在当时对人们作深入的全球化问题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直接由此引起的1990年代初期新思潮是“后殖民主义”。它以上述理论为武器,提出了反对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霸权,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霸权,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背景,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力图摆脱西方势力的束缚,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自由。直到今天,后殖民主义仍在发展中,并成为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并在未来全球化过程中力图解决的问题。

随着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升级。199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声称,“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于是各国政府纷纷研究并制定自己国家的全球化战略,力图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有利的位置。这无疑调

^①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第2卷,第108页,1985年。

动了理论界各个学科的力量,展开了对全球化的全方位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9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全球化研究再度升温。但与先前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多半不再像先前那样对全球化只抱乐观态度,而是抱谨慎态度,有的甚至抱悲观态度,因而,不仅研究自己国家或集团的发展战略,也研究防御金融风险的战略和措施;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纷纷呼吁并积极研究全球化的秩序问题,包括全球化的伦理、规则、法律、政府间关系、全球治理等问题。

这样,全球化研究的文章、著作不断推出。Samir Amin 于1997年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Fredric Jameson 于1998年组织国际研讨会并编辑出版《全球化的文化》;Zygmunt Bauman 于1998年推出《全球化:人类的结果》;Dean Baker 于1999年编辑出版《全球化和进步的经济政策》;Thomas Klak 于1997年编辑出版《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Robert Holton 于1998年出版《全球化和民族国家》;Peter Waterman 1999年出版《全球化、社会运动和新国际主义》;Tony Spybey 于1996年出版《全球化和世界社会》;Ankie Hoogvelt 于1997年出版《全球化和后殖民世界:发展中的新政治经济》;Birgit Meyer 和 Peter Geschiere 于1999年编辑出版《全球化和认同:流动和关闭的辩证法》;Raimo Vayrynen 于1999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加拿大举行的关于全球治理的联席会议文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Avtar Brah 等人于1999年编辑出版《全球未来:移民、环境和全球化》;哈贝马斯也发表《全球化评论》。进入新世纪,更多的作品推出,如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等合著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保罗·赫斯特等的《质疑全球化》,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的《全球化与世界体系》,Samir Amin 的《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威廉·格雷德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等等。

世纪之交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会议都与全球化问题有关。

1999年2月12~13日美国“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等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正义与全球经济”;1999年4月27日“国际贸易与经济政策研讨会”在美国召开,会议主题是“危机继续:反思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斯坦利·弗希尔发表题为“危机的教训: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讲话;1999年5月5日,“'99世界经济论坛”召开,讨论处在21世纪大门口的人类应当如何对待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全球性”问题;1999年7月11~15日世界著名的国际社会学会在以色列举行本世纪最后一次大会,会议主题是“全球化时代多样性的现代性”;1999年10月27日,泰国曼谷将召开全球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目的在于总结东亚危机的经验教训,制定东亚各国发展战略;2000年下半年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将在巴黎举行“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国际大会等。

同时,还出现了全球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如设在美国Warwick大学的“全球化和地区化研究中心”、“全球化增长协会”、“全球基金组织”、“全球发展中心”等。同时,还出现了为全球化研究和学习、工作服务的企业,如“Bowne全球解答”(公司),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全球化术语表”、“自动语言转化(工具)”等。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与全球化有关的“跨文化研究”和课程,出版了不少的书籍和教材。

中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90年代初期,那时,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

1997年,东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的威胁已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1998年3月9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 and 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①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全球化论丛》,由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后来,又推出了《全球化论丛》(Ⅱ),共五本书:《全球化:中国道路》、《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化:国家主权》、《全球化:当代西方理论前沿》和《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全球化研究被深入推向各个领域,各种研究资料汗牛充栋,细细观之,主要从经济全球化角度论述,以及全球化对政治、文化和科学等的影响以及各种应对办法。

^① 《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二、全球化研究方法

理解和诠释全球化与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决定了从什么角度或切入点观察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到如何描述全球化现象和揭示其运行规律。

首先是分析单位。吉登斯指出,除了个别学者的著作之外,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研究,另一类是世界体系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分野之一是分析单位不同。两大流派虽然探讨相似的问题,彼此之间却极难沟通。

国际关系流派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透视全球化过程。这类研究通常着眼于经济关系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把全球经济看做生产和其他经济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各国经济融合。这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社会理论长期被以社会或者国家为中心的模式所左右,把国家当做社会分析的给定单位。这一传统难以突破“国家”、“社会”这些概念的束缚,难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

国内外许多研究把民族国家视为天然合理的分析单位,从一国或某一类国家着眼,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在这些国家之内再细分几类,看全球化对一国、各类国家的所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那些超国家组织,例如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等,则被看做全球化力量的代表,对各国经济、政治施加影响。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决定内部事物的主权越来越小。正如人们指出的,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缺陷在于,只涉及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即国家间的国际协调,而这越来越不能正确概括当今的国际秩序。例如,把民族国家看成在国际舞台上独立的、彼此相互对峙以及与其他组织互动

的主体,就难搞清那类既不在国家之间、也不在国家之外,而是处于跨越国家分界的社会关系,因而,全球体系不能被理解为只是包含多个社会和(或)其他大规模行为者的一种态势。人们还指出,强调全球特征并不会模糊所有社会体系都是相互联系、重叠甚至镶嵌这一事实,只不过社会关系中可能存在“全球性”的一面,需要从“特有的全球观点”来看待和分析。但是,也有许多人不同意把全球体系看作一个自主的体系,它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国家和社会单位以及团体和个人。

从国家主权受到的限制来诠释全球化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把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看成似乎是一致的。这一倾向不仅在涉及国家主权,而且在涉及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中也很常见。现实中,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主权遭到削弱,而另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由于联盟、战争以及各类政治经济的变动,主权范围有所扩大,这两个过程往往是同时产生的。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的作用都差不多相同,例如国家主权都遭到削弱,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全球化的辩证过程。

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的分析很不相同,它把世界经济当做一个整体、当做一个基本分析单位来看待,从而突破传统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世界体系论以历史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选择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既不出自于臆断,也不出自于分析方便,而是由于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若解开它的谜底,就能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的矛盾、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有自身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合法规则,以及内聚力。体系的生命由彼此冲突的力量造就出来。这些力量之间的对峙使体系得以作为整体存在,而当每个群体试图把体系变得对自己永久有利时,冲突力量就使体系解体。它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即存在生命周期。很明显,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类相关或看似相关的各种因素和过

程的综合。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例如,吉登斯指出世界体系论由于过分集中于以资本主义来解释现代历史的演化,未能对国际关系流派关注的民族国家兴起问题做出满意的分析。

另一个方法论问题涉及学科分野。大致存在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学科范围内的研究,另一种是综合性或跨学科研究。前者源于西方学术传统。经过认识论的长期演变,社会科学的学科已经相当明确。这种认识论把人文社会研究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相对立的状况加以制度化,确立了独立的学科或领域,例如,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等。在每一个学科中,又分为多个专业甚至更细小的专题。例如,国内外一些全球化研究强调“经济”全球化,至少部分地是为了突出学科特色。经济学内部各专业则集中于更专门或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常见的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

综合性或跨学科研究有所不同。跨学科研究很早以来就不乏提倡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被称为跨学科研究时代。全球化研究中已出现不少跨学科研究成果,今后很可能会更多。世界体系论可以被看做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尽管遭到过于注重经济分析的批评,但这一学派采用的是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等多层面和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方法。沃勒斯坦曾经提到,不能将真实世界的现象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样三个(或更多)范畴,以不同的方法在封闭的领域中进行研究。因为,经济有它的制度根源,政治是社会经济力量的表现,社会结构则是政治、经济压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的,把它们分开研究,难以反映和理解真实的历史现实。事实上,世界体系论者不以跨学科研究为满足,而提倡打破现有学科界限。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据以分科的标准,包括分析层次、中心问题、方法、假定等等,或者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或者即使还有现实依据的话,

也已经成为新知识形成的障碍。所以,应该以探索或研究领域来代替传统的学科分类。

在全球化研究中,还可以发现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统计计量方法等等。除分析单位以外,各种方法还涉及指标体系、时间、主体、客体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论问题可能会更多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三、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

全球化的概念和观点如果不是直接源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也一定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全球经济中的行为者;全球体系的形成是单一还是多个逻辑作用的结果;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结构,以及行为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内部/外部分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变量和常量;全球化的演变方向及其是否具有革命性意义等等,不同理论和历史分析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在一些理论分析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在另一些理论之间则截然对立。此外,虽然全球化研究中基于各种学术传统的看法很多,但真正自成体系的学派似乎并不多见。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

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会因民族国家边界的存在而被阻止,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现代殖民地正是资本在全球进行地域扩张、征服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当代中国学术：
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